

抗戰時期中國基督徒的民主想像與認同政治

■ 許俊琳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近代中國基督教最重要的特徵是它不僅是宗教團體，更重要的是一種公共性的社會力量。特別是在其中佔據主導的自由派，一直保持著與時代對話甚至引領時代的抱負。用他們的話來講，就是要將基督教打入中國社會的中心。其意在實現救國、為基督教的價值正名等多重的政治和宗教目標，是其中國人和基督徒雙重身份的一種體現。他們對民主的頻繁言說和委身就是基督教介入公共的一種方式。隨著五四「德先生」的出現，民主在中國享有了一種話語權威。誠如基督徒、光華大學的詹文滢所言：「趨勢所至，向者為政治理想的民治主義，今已變成一個習慣法了，全世界的人士，莫不俯首膜拜，尊之為人生救星，威權所至，只許他人頌揚，不許他人批評，更不許他人惡言痛詆；世人崇拜民治主義的熱忱，可謂達到極點了。」^[1]因此，民主成為各種力量角逐的對象，以之作為自身合法性及獲得認同的資源，同時完

成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願景。基督教也不例外，從五四開始，民主一直就是基督徒話語中的核心觀念，成為他們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宗教認同等身份敘事的一部分。但在不同時期他們的民主話語卻不盡相同，本文主要以抗戰時期為視角，探討其特殊性及同一性，也為國人追逐民主提供一個基督教個案，以便更深入理解民主在中國命運的複雜性。

一、抗戰危機下中國基督徒的民主兩難

一般而言，在民族危機的時刻，權力會趨於集中，為獨裁提供可能。「九一八」後少數基督徒的抉擇可作為其中的一個注腳。晚清以來基督徒一直把民主的求索作為其政治目標，視為信仰的要

求。但九一八後，有少量信徒傾向於借獨裁來救國（當然，這種聲音屬少數，更多基督徒仍堅守民主，但這成為基督教中的一個特殊現象）。這與

摘要：基督徒一直是中國民主運動中的積極參與者，但受九一八後國難加劇及國際民主危機的刺激，少數基督徒暫時實用主義的選擇新式獨裁。而抗戰爆發後，為實現最大限度的民眾動員及黨派特別是國共的團結，他們完成了比較統一的民主站隊，視民主為抗戰勝利的保障。在因國民黨一系列民主表示而掀起的1939-1940年第一波憲政運動中，基督徒廣泛地介入了這場運動的討論，並激勵基督徒加入推動民主政治的行列。但1940年9月因國民政府的拖延使第一次憲政運動流產後，受國民黨戰時不提憲政的限制，基督徒的民主言說陷入相對沉寂。而隨著1942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成立，為民主而戰成為口號，增添了基督徒對民主的信心和欲求，他們積極參與第二波憲政運動，反思西方政治民主的片面，對中國式新民主展開了新的思考，以完成抗戰民主建國的目標。

關鍵詞：抗戰時期；基督教；民主；民主運動

1930年代民主在西方乃至世界的危機相連，正如歷史學家伊斯頓(S.C. Easton)所言：「民主國家沒能克服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困境成為普遍喪失對民主體系信心的主要因素」^[2]。庫恩(Hans Kohn)1937年也在《基督教世紀》發文稱：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雙重夾擊，普遍認為民主在歐洲處於防禦狀態，一些敏銳的觀察家甚至宣稱民主處在臨終的喘息中。^[3]

西方這種遭遇獨裁威脅而帶來的民主危機也為中國基督徒所洞悉。《興華報》1931年發文指出歐美各國已趨入一條絕路，經濟上產業越合理化失業越多，政治上德莫克拉西政治已充分暴露其弱點，而漸趨於獨裁制度。^[4]1932年培玉也觀察到：帝國主義國家政府相繼改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日趨獨裁化和強硬化，正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上邁進，這不僅表現在德意，同時也表現在英日等國。^[5]第21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中國委員會報告書中也指出：「有些地方民主政治遇到了公開的挑戰，獨裁主義雖然壓迫一切個人的自由，卻漸漸被認為救濟目前的出路。」^[6]總之，民主在西方遭遇危機，世界正被帶往獨裁的道路。

西方民主的危機把這些問題擺在了國人的面前，而1930年代國內的民主與獨裁之爭及國難加劇成為其本土語境。正如教會領袖陳文淵所言：專制政體的復現和民主主義的沒落成為世界轉變中的新趨向，德意俄和其他小國的專制政體對民族復興似乎得到大的成功，統制政策和中央集權也得到相當的效能，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興趣，到底中國是向著民主主義的道路走還是隨著世界潮流採取獨裁制度？^[7]陳文淵難題也是基督徒所共有的難題：美麗的民主好看卻似無效，專制難聽卻貌似成功，和當時的國人一樣，基督徒走到了一個岔道口。

據此，在民主危機集權歡唱的時代，不乏基督徒對民主的信仰動搖而傾向獨裁。1931年12月，因九一八的刺激，從之就謹慎地聲稱國民黨要有麥克唐納就好了，能徵集全國賢能，共圖國事。如沒有，有墨索里尼也行，能排斥一切主張，獨裁專制，能統一全國，平定內亂，解決民生，共赴國難。但國民黨絕對不能叫一個沒有墨索里尼之才的人

來做中國的墨索里尼，走這條路要謹慎，有危險性。^[8]從之的觀點，作為一種典型的政治實用主義，很具代表性，民主也好專制也罷，並不在追求它們的終極價值，而在利用其工具價值，只要能借之實現中國的拯救就好。這種實用主義傾向在包括基督徒在內的中國人中是很普遍的。

專制並非是不可接受的。趙鴻祥在1933年就羞澀地為專制辯護道：最近十年比較興隆的國家是蘇、意，這種由民治而專制的潮流使人非常詫異，但奉行專政何嘗不是全部歷史的軌跡，崇拜權威何嘗不是整個人類的根性。^[9]甚至燕大教授吳雷川為時代風潮所襲，也認為如時勢需要，自由平等可為獨裁讓路。他在1936年寫道：「基督教以自由、平等、博愛三者為人類社會最高的境界，這自然是人人所想望的。但耶穌教人要服從真理，而真理又必因時代的需要而變動不居，決不可以執著……自由須受真理的範圍，本不是個人任意發展……人類社會最高的境界，現時還在理想之中，需要我們經過長時期的努力，然後才能實現。我們現時只可對準這最高的真理努力進行，而不可先企圖自己當下就享受這種幸福。所以，如果說集體主義或獨裁政治是合乎時代性的真理，我們自由平等觀念就當為真理而暫時放棄。這也是基督教的精神。」^[10]時代風氣確使崇尚自由民主的基督徒開始為獨裁打開一個缺口。

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基督徒明確倡行獨裁，以新式的專制模仿德意等來解救中國危機。在民主獨裁論爭前、法西斯主義在中國初唱的時節，1933年5月閩南基督教領袖蔡重光就鑒於民族危機的嚴峻，而將新國家的再造寄托在健全的領袖和嚴密的組織上，只有這些能在內部紛亂、外辱加劇的時刻，恢復民族的地位。而他認為「要使組織的嚴密，最好的方法莫如獨裁，一班人好似一聽了獨裁，便會聯想到過去的帝王，但是我們所主張的獨裁，並不是自私自利的獨裁，而是為公為眾的獨裁，我們要堅決的認清，獨裁並不是壞事，只有路線走錯了才是壞事，如果是路線走錯，不管是獨裁不獨裁都要倒台，如果是路線正確，獨裁反可使理想實現快些，所以獨裁的制度是目下組織中一個最良好、最進步的方法，斯丹林之於蘇聯、墨索



里尼之於意大利和最近希特勒之於德意志，都是由獨裁而成功的」^[11]。看來德意俄獨裁所帶來的成功對蔡確有強烈吸引力，他所意想的健全式領袖獨裁可謂發民主與獨裁論爭中新專制主義之先聲，受內憂外患的雙重侮辱，德意俄的成功仿佛為他帶來了某種希望。

有同樣取向的並非蔡一人，四川中華基督教會的蕭文若（曾留洋）在1935年也表達了對新式獨裁的渴望。他認為不管是教會還是國家，獨裁的價值不可蔑視，而民主的弊病卻不能忽略。他表達了對獨裁的肯定：「獨裁這件事，個人近來很有同情」，「你看世界的政治潮流，不是趨向獨裁麼？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忒拉、俄羅斯的史大林、土耳其的凱馬爾，這些國家都因實行獨裁，而使民族復興」。而他對民主的苛求主要是因其效率的緩慢，因為「用民主的辦法，今日一會議，明日一會議」，難以成功。因此他肯定獨裁的價值，特別是對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老實說，一個戰敗的國家，被壓迫已深的國家，積弱已久的國家，非有俊傑之士，出而獨裁領導，那個民族，是不容易恢復發達的。教會亦何獨不然？」作者最後總結到「共和與專制，應該澈底，不要以共和為工具，達到專制的目的。若一味獨裁，只要有不世出之士出來執行，我個人是絕對贊成的」^[12]。蕭的獨裁和當時民主與獨裁論戰中的開明專制論一致，德意俄獨裁帶來的成功對他有明顯吸引力，可作民族復興的憑藉。

抗戰全面爆發後，民主與獨裁的論爭為抗戰的硝煙打斷，但二者間抉擇的兩難仍然延續。戰爭在為集權提供正當性，但戰爭需要更廣泛的民眾動員，因而集權和民主在吊詭中獲得各自的發展空間，國民政府在加強權力集中的同時不得不開放部分民主。在二者的博弈中，引發了兩次大規模的民主浪潮，一為1939-1940年間的民主憲政運動，二為1943年興起的第二波民主憲政運動。基督教的民主言說也隨這兩股潮流而波浪起伏，但為了國共的團結，實現最大程度的民眾動員，他們完成了比較統一的民主站隊。

早在1937年底上海麥倫中學校長沈體蘭就指出，在日本侵略的形勢下，「一個新的時代來臨。

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必須相互依賴，二者離開了誰都不可能成功」。^[13]1938年廣州培英中學的李聖華也看到抗戰需要民主，他呼籲應把民主主義完全把握，除少數人認為抗戰時期民主不是最為切要者，民主主義已是國人一致的要求。^[14]他們比較敏銳地看到民主在抗戰中的作用。

更明確提出抗戰建國離不開民主的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吳耀宗，他強調只有民主才能實現大規模的民眾動員，只有民主才能化解政府與民眾的芥蒂，成為抗戰建國的保證。他認為必須運用政治的民主，因為抗戰需靠民眾的力量，建國更離不開民眾，政治軍事經濟都有民眾做後盾，才能達到最後目的。「假如沒有民主的政治，則民眾的力量，決不能充分發揮」。他對用獨裁積聚民眾的看法不以為然，他認為獨裁絕非凝聚民眾的合理手段，法西斯國家雖能暫時利用好聽的名詞，欺騙民眾獲得一時的獨裁，但這與民眾的利益相反，終必被推翻而代之以真正為民眾謀幸福的民主政治。他並進而談到：中國與法西斯國家不同，在救亡圖存中，全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用不著欺騙民眾，也不能欺騙民眾。人民愈有自覺自動的能力，愈能與政府合作。因此「我們必須使民主政治成為支持抗戰建國的一根偉大的柱石。在不違反我們所承認的國策的條件之下，我們要爭取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要消滅政府對民眾的懼怕，要使民眾對政治上的設施，有發言的機會。總一句話說，我們要使政府成為人民的政府，這樣，我們才能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目的」^[15]。在他看來，民主並不是一盤散沙而成為團結的障礙，反而會成為力量凝結共同抗戰的前提與後援。

而到1939年7月吳在華東大學夏令營的演講中重申了這一看法，但他為兩年來的抗戰所憂慮，黨派摩擦和妥協心理被他用作民主不足的證據，而唯有民主政治才能徹底克服它們。他呼籲到：「我們還要爭取民主政治的實現。民眾自發的力量，在平時需要，在戰時更是需要。要動員民眾，就必須有民主的政治。可是在抗戰兩周年後的今日，我們還看見許多與此相反的現象，這不但減少了民眾參與抗戰的效能，也是違反過去所確定了

的政治的原則。必要確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我們未來的建設才能走上正確的方向」^[16]。對他而言，只有民主激發的力量才能避免妥協的誘惑，才能化解黨派的衝突，確保抗戰的最後勝利。

二、第一次憲政運動與中國基督徒的民主想像

在兩年的抗戰動員中，民主力量培育壯大，引發了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第一波憲政運動。這激發起基督徒的民主想像，他們廣泛地介入討論，並激勵廣大基督徒加入推動民主政治的行列。1939年10月在昆明舉行的全國基督教學生代表會議宣言中就聲稱「吾等主張建立完成民主政治政體」^[17]。特別是在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確定1940年11月12日召集國民大會之後，基督徒的民主熱情進一步高漲：問題不再是要不要民主憲政，而是怎樣促成民主政治的實現及基督徒在其中的作用問題。

羅茜觀察到：中國人民已認識到「只有充分的實行民主政治，才能動員全國各方面的力量，才能把抗戰推向勝利的階段，才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她強調只有少數別有用心、認賊作父的人才會反對民主政治。她對民主的想像也是指向抗戰建國的，而她將其歸宿指向三民主義。她談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一部實施民主政治的大綱，假使完全實施了它，就能得到『民族解放，民生幸福，和民權平等』。中國目前的抗戰，也可以說是為了爭取民主政治，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憲法，三民主義的共和國。」三民主義作為國共都接受的合作基礎，為抗戰時的基督徒一再強調，以作為催促國民黨走向民主的理由，同時也是維繫國共團結的資源。作者看到民主在中國可成為建國的工具，有完成制度更新的可能，也是向天國邁進的途徑。她認為「今日的統一戰線，民主政治，是建設新中國最好的工具。在運用這些工具時，保護了『人的價值』，可能用『和平』的方式，使新中國的政治制度進入更高階段。這樣假使我們說『民主政治』是一種方法，可能使我們接近『上帝的旨意』，相當地實現他的理想，那也未始不可」。但對民主的推崇並不是對它的迷信，只因

它是一種相對美麗的方式。作者承認，民主並非十全十美，但在現在的中國是進步的。民主制度也不一定就是天國的理想，但在現階段最為接近天國的理想。因此，他呼籲基督徒必須履行國民的責任，促進民主政治的完成：「基督徒學生不但當注意政治，或站在批評或旁觀的立場上，而應當積極的以國民的一分子，或社會成員一部分的資格，站在客觀的，超黨派的立場上，推進『民主政治』的澈底實現。」^[18]羅是在對民主的呼求中能清醒認識民主限度的少數人之一。

哥林也在1940年2月認為民主政治是實現團結和進步的關鍵，從而是抗戰勝利的保障。他鼓勵基督徒學生「投進爭取民主政治的巨潮中去」，因為「為了自身生活的改善，為了中國社會政治的進步，民主政治的實現是必須要的」^[19]。同年4月他進一步呼籲基督教學運應積極介入民主運動，因為「民主政治是一切問題的鑰匙。把握住它，就能解開許多疑難的問題，在今日的中國更有實際的效果」，「才能切實取得民族解放的成功」^[20]。青年會幹事俞沛文也認為民主政治「是決定抗戰成敗，新中國建設前途的關鍵，不實現民主政治，就不能切實動員廣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就不能加強團結，爭取進步！」^[21]他們的邏輯仍在沿著民主實用主義的路線走，民主的力量被進一步放大，借之近可抗日遠可建國。

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基督徒開始大膽地擁抱民主政治，將它視為救國的路徑、民族解放的鑰匙……總之，它是解決中國問題的總閘門。常青1940年4月寫道：「中國的客觀環境正在飛躍的進展著，現在正要迎接一個劃時代的巨大的運動亦是謀中國抗戰勝利唯一的武器——迎接憲政運動，建立民主政治，它是民族解放的鑰匙，是民眾生活幸福的樞紐機，它將洗刷愚、貧、弱、貪、亂的民族五大污點。」^[22]在他看來，只要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同年青年會幹事張仕章也聲稱民主政治可成為青年終極的信仰，他認為「民主主義是政治組織的完美理想，也是共和政府成立的基礎」，「民主主義是一種最合理的政治學說，也是一種最可貴的政治精神。所以青年們對於民主政治應當抱著堅定不移的信仰與竭誠擁護



的決心」^[23]。其中似乎有一種美化民主的理想主義傾向，走向民主萬能的道路。

為了將一些藉口政教分離而不願過問政治的基督徒從民主的隔閡中呼喚出來，他們也努力拉近基督教和民主的關係，將民主政治與基督教相提並舉，在推動基督徒走向民主的同時為基督徒的民主參與正名。早在1938年聖誕節張仕章就聲稱「民主主義就是天國主義的代表」^[24]。吳耀宗也曾提出：民主即基督教——尊重人格、個性，要使每個人得到豐富的生命，它深感人的缺陷和有限，但都是上帝的兒子——教義的運用。^[25]後來他又認為「『民主』也就是耶穌教訓中，我們要『彼此相愛』的政治方面的表現」^[26]。他們都是將民主視為基督教的產物，同時反過來以此助推基督徒實踐民主。這種個人化的認識甚至上升為某種共識。1938年8月中國代表在為國際宣教協會印度會議準備的文獻中，也把中國民主的走向導向基督教，指出「中國正在努力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而基督教和民主有一種特別的聯繫。西方民主僅一半是希臘的，剩下的是基督教的。基督教比希臘人更能理解人的政治原理」。「民主問題將產生於公民的公共精神及自願為公共福利的犧牲中。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除了國家當局的強制，這是不可能被同意的。民主看上去好像太微弱而不能產生它自己必需的質量。基督教必須用它的教義拯救它，只有在他服務一個超越國家的更高存在時他才能更好的服務國家。」^[27]在他們看來，基督教是民主的來源和保證，能促使民主走向完善和成熟。

而到1940年4月，國民政府宣布召開國大，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基督徒參與民主政治的迫切性更著。錢國寶就認為抗日總動員是民主政治推進中一個新階段，基督教和民主政治有歷史關係，基督教注重個人自由和個性發展，基督教史的全部隨時隨地都可找到耶穌散布民主化的種子，他已奠定了民主政治的根基。因此他呼籲基督徒響應精神總動員，實施憲政，以完成抗戰建國。^[28]國民政府的抗戰動員，確實為民主精神的煥發及民主運動的參與提供了一個契機，基督徒正是在這種廣泛的動員中看到參與政治的可能而一步步走

向民主。耶穌也被他們描繪為民主的化身，作為激勵基督徒迎接民主的催化劑。白石就認為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民主的是耶穌，他雖未提民主二字，但他通過當時當地的生活與言語，將民主意味的理想發表並實踐出來了。他譴責少數基督徒以政教分離為由不願過問政治，是違反了耶穌的教訓：「他們對民主問題不聞不問，不但是違反了耶穌原來的立場和精神，不但表示了他們自私的偷生怕死，同時也是最短視不過的。在今天，我們不去顧問政治，明天，政治會反過來干涉我們。」^[29]以耶穌的名義來指斥部分基督徒對政治和民主的止步，可謂是一種根本方法。

嶺南大學教授謝扶雅也宣稱：「憲政是合於基督教教義的，因為憲政就是民主政治。反過來說，反民主的各種政治都不合於基督教教義的」，民主政治「可稱最理想的政治，即基督化的政治」。因此，他呼籲基督徒積極參與憲政運動，忠盡國民的義務，他認為「中華民國憲法底制定和憲法的推行是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底天職。中國基督徒並不因信奉基督教而喪失他國民的資格，亦並不因記名教會而喪失他本國的國籍。既然中國的基督徒也仍是中國的國民，當然應該和全國國民一樣，一體參加憲政實施運動」^[30]。以國民義務和民主的基督教性質將基督徒推向憲政運動。路西也談到「『民主政治』這一種的政治制度、政治理想，和基督徒學生們所信仰的基督教的社會理想，好像是相當接近的」，兩者在歷史上有血緣關係。因此，「基督徒是擁護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實施，是可能使基督教社會理想帶前一步。因此這重要的一步——實施憲政也必須為基督徒所注意和努力的」^[31]。作者同樣以二者親和性推動基督徒參與民主運動，民主政治不僅符合基督教理想，也有利於基督教的推進。

國民黨的憲政允諾確實給基督徒帶來了巨大的希望，他們看到了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可能。1940年4月全國基督教學聯也認為實施憲政是實行民主政治的一大步驟，也是抗戰建國所不可缺少的，民主政治已成為今日中國基督徒所共同追求的一種政治制度。它並致函重慶國民參政會，呼籲實施憲政是目前最急迫的首要任務，唯此才能

保證各黨派及全國人民的團結，才能保障抗戰到底的國策和爭取最後勝利。^[32]表達了對國大召開的希望。並發布《基督徒和實施憲政討論大綱》主要探討基督教和民主政治關係、戰時民主化、五五憲草等。^[33]

上海基督教學聯的顧以佶也觀察到：民主政治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進步的，它一直遭到封建勢力的強烈反抗而沒能在中國真正實現。抗戰與建國並舉，抗戰將會掃除一切落後倒退的因素，驅除民主的障礙，為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提供可能。而基督徒正可以成為其中的一股力量，因為實行民主能給大多數人以自由，減少社會的剝削和不公，基督徒的利益永遠和大多數人在一起，所以「我們無條件的贊助民主政治」。她對即將召開的國大寄予崇高的熱情，她談到：「中國將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真正來制定憲法，實行民主了！這是中國空前的一大進步現象」，但她認為這種進步是不夠的，基督徒的眼光只有天國的實現才是我們進步的終點。我們必須克服民主的障礙，徹底的實行民主，才能進一步接近天國。^[34]她呼籲基督徒要借助國民黨倡開國會的東風，將民主之路走到底，徹底的實現真正的民主。

吳耀宗也為憲政運動的開啟歡呼，呼籲基督徒要在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1940年6月談到：「很可喜的，憲政運動已經開始，而民主政治的要求亦普遍於全國。中國的基督教運動在這時候，不但對於憲政運動應當予以有力的推進，並且對於一般民眾的民主習慣、生活與智識的訓練，也應當負起領導的責任。民主政治不但與抗戰的勝利有極大的關係，它也是人民在抗戰過程中及抗戰完成後，所當享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基督教對此應該可以有巨大的貢獻」。吳的觀念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戰時民主的工具性，而將其推向民眾權利與義務的共享。他認為基督教中的民主因素可為憲政運動提供某種助力，歐美民主浪潮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是緣於基督教的。「基督教應當成為一個實現和擁護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基督教的教義是尊重人格、尊重個性、尊重自由的，而這些都是構成民主主義的要素的」^[35]。

既然基督教應開步走向民主，那麼它何以能

成為民主的幫手呢。1940年斐明認為基督教青年會本身就是一個民主模型的縮影，應且能為推進民主運動出一份力。他談到：「青年會的本身，是有歐美民主運動所影響的優良傳統，它是包括了當地社會各式各樣的人們，代表著社會上的上層下層分子，各種職業、年齡、階層的人民，他們不但在青年會工作中接受了公民的常識訓練；或是通過青年會的活動給予了更多的人一種公民訓練。這些優良的條件和途徑，為造就『好團體』『好國民』頂寶貴的財產了。也可以說，青年會過去，已經成『民主運動』具體實踐中的一個『雛形』。」因此，他呼籲青年會應發揮自己的力量，「積極的主動的對全國人民的理想——民主政治，作最忠誠熱烈的服務，使人民的生活理想獲得實現的可能！」^[36]作者並列舉了青年會的民主程序供參考。青年會確實不僅自身即具現代意義的民主團體，同時在公民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吳耀宗也曾編輯《基督教與民主七課》來說明基督徒認識基督教和民主的關係及其在民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他並巧妙地引入經濟民主的概念，強調「不論處境如何，人類的需要原是相同的，只要願意工作，每個人都有同樣權利得到他的物質需求的，這與一般社會制度——重視少數特權階級的權利，而忽略了大多數處在不幸環境中的需要，是正相反的」。^[37]與1920年代工業民主所呼籲的利潤均佔相比，經濟民主的訴求更帶有社會制度轉變的意義，這成為他否定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鋪墊。

除了青年會主導的社會化公民教育，燕大教授劉廷芳則強調教會學校特別是大學要承擔起民主教育的責任。1940年他撰文闡釋了基督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重合後，呼籲教會學校要以民主教育為藍本。他認為民主是一種人類最宏大的努力，大學教育即為國家創造能夠實現民主主義的青年男女。基督教雖非一種政治制度，基督主義和民主主義也不能劃等號，然而充分實現基督主義，民主主義的基礎便已完成。民主的基礎在尊重人格，民主的成功在人人彼此尊重人格。基督主義看人人為神的兒女，人人都值得神流血救助，彼此相愛，是基督主義的要點，也是民主主義實現的最高峰。因



此，教會學校當前極重要的責任就是確定民治的信仰，實現民治的精神。^[38]在為民治主義確立基督教的基礎後，他又另文宣稱在實施宗教教育時，要注重民主中個人和社會的辯證關係。民治主義是指個性的表示，也是指個人對社會負責的反應，一指自由一指服從紀律。民治主義的希望是兩極的，因為尊重個人它要求自由，因為尊重所有的個人它要求約束。個人的觀念要設法和社會約束個人的觀念相調和，使每個人因為要得到整體的利益而犧牲最低限度的自私欲望。而政府是一種從許多個人方面勉強所得到的一種讓步，政治則是一種講究妥協的藝術，我們主張讓社會約束我們，這種約束也能承認個人人格的表示。^[39]這種將自由和約束並舉、平衡個人和社會關係的民主理解，一方面是西方自由民主觀念的延續，但同時有打上了中國本土的色彩，試圖為大時代中的民主教育提供一種指導。總之，第一波憲政運動確實使基督徒開啟了一場民主的盛宴。

三、抗戰中後期基督徒的民主敘事與身份政治

1940年9月國民政府藉口交通不便，延緩召集國大，基督徒的民主期待為民主拖延打破，第一次憲政運動流產，其民主話語陷入相對沉寂。但基督徒在這種廣泛的民主討論中受到了教育，民主更廣泛也更深入地進入基督徒的心靈。並且隨著美蘇參戰，世界反法西斯聯盟在1942年1月的成立，為民主而戰成為口號，更增添基督徒對民主的信心和欲求，民主是大勢所趨，二戰的勝利屬民主國家開始為他們所強調，而過去對列強的帝國主義定性也開始為民主國家取代，儘管它是一種片面的民主。他們對民主的信仰並未丟失，只不過需要它的完善。1942年女青年會所編的大戰研究綱要追問：民主政治和經濟民主是什麼？是否可以有政治民主而無經濟民主？或者相反？共產主義是否和民主衝突？^[40]這些成為了基督徒普遍而亟待解答的困惑，說明他們對民主的關心及民主觀的成熟。

1942年4月吳耀宗在對新中國的憧憬中描畫了它的輪廓：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經濟平等和政治

民主，民眾可以享受自由，以真正代表民意的機關去決定國策，掃除政治上的貪污和妨礙民眾發展的力量，杜絕內爭。他認為抗戰必勝，大戰的勝利屬於民主國家。他並重申基督教可以成為促進民主政治實現的動力，基督教尊重人的個性和尊嚴的教訓，是民主主義的基礎，基督教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是民主主義的實施，基督教應以先知的精神促使民主理想的實現，基督教的種種活動都在從事於民治生活的實現，使民眾了解民主政治的意義，表現其精神，以作實施民主政治的準備。^[41]第一波憲政的流產並沒有使吳喪失對民主的信心，勝利屬於民主國家也是他一直強調的議題，並確信基督教對民主的價值。

聖公會陝西主教沈子高也在1943年的演講中將民主視為中國的未來，且同樣堅持基督教對民主的意義。他強調「中國政治的前途，就在乎它是否趨向民治，是否提倡國際和諧的政策以及是否注重人的價值，一個政治開明的國家是寬大的，不限制她國民的思想，而且盡量鼓勵各種思想的發表，在政治與教育上也是鼓勵各種試驗的實現」。表達了他對民主政治的信仰，他並以基督教對民主政治加以規訓。他談到：「基督教一個最基本的觀念就是人的價值，人的靈魂的價值。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的，乃是國家為人的發展而存在。換句話說，個人是目的，國家是方法，這一種組織在永生的目光下只是一剎那而已。然而人的靈魂比國家的壽命卻常得多」，我們只允許在某種限制下具有國家觀念，不允許國家崇拜。更不能以人為工具，多數人宰製少數人，「真的民治主義，是多數人和少數人彼此尊重對方的主張。沒有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人能包辦真理」，不能輕視少數人的存在。^[42]沈從基督教守護個人價值的理念為民主張本，而防範某種集體的僭越，是深諳民主的根本，較一些基督徒單純地呼喊基督教為民主的源泉要深刻得多。

加拿大女王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哲學教授格雷戈里 (Gregory Vlastos) 1939年出版的《基督教信仰和民主主義》對中國基督徒的民主觀有較大影響。其1941年翻譯由青年協會出版。張雪岩在介紹該書時也將民主引向基督教，張寫到：「全

書重心，在指明今日各種衝突的政治思想中，以民主主義最屬合理，最與基督教信仰契合，但真正民主主義的實現，卻是要假宗教的熱情與真誠，因為只有熱情與真誠，方能對主義負責，為信仰奮鬥。該書同沈子高一樣，將基督教描繪為民主的最後保障：「基督教的教訓，專事提倡各人的尊嚴性，這是別的宗教所沒有的。如果一個人依照他所認定的契約的內容去做，使社會的公共生活得以合理的進行著，那末，他便享受了一個有理性的人所該享的尊嚴的地位了。如果各人為了事業而犧牲，使公共的生活達到目的，他便取得了個人的尊嚴地位。一種是先知們所要求的公平的骨幹，另一種是耶穌的愛的福音裡的實質。公平確定了各人有一個被尊為人的權利，這個信念的本身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用以達到另外一個目的的方法。如果一個人能貢獻他自己的生命，提倡社會服務，愛心便能確認他的目標，引導他尋得自己的生命。等到這樣的愛成為民主主義的動機，這樣的公道成為它的準繩的時候，民主主義才有了它的意義」^[43]。

他同樣表達了對西方片面民主的憂慮，而呼籲民主有向經濟擴展的必要。但他首先關懷的是政治民主的危機。作者寫到：「我們並不怕失去那從未得到過的經濟上的民主主義，只怕丟棄我們所享用的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在經濟上，我們實行經濟的專制制度，把全國大工業集中在極少數的實業家和金融家手裡；在政治上，我們實行政治的民主主義，承認一切人民皆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一切自由權；這便是危機所由產生的地方。民主主義的危機並不是來自於左方，卻來自右方。因為，如果民主主義能保得住，工人和農夫可以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但少數的資產階級卻害怕民眾覺醒後，把民主主義的勢力實現在經濟改造上，因而揚言破壞民主制度，如德意等國所發生的那樣，英美民主根底較深的國家也有發生的可能。因此，作者呼籲以民主的完善向經濟民主的擴展來挽救民主，他總結道「我們的責任當然是保護民主主義；要把政治方面的民主主義保持穩固，然後把它推廣到經濟方面去；一方面又要充實民主主義的實力，使它有去應付內在和外來

的敵人。」^[44]作者這種基於完善政治民主同時推動民主向經濟等其他方面拓展的取向很受中國基督徒的歡迎。

吳耀宗即有相似的思想傾向。他在1943年7月重新表達了民主國戰勝軸心國的信心，但他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我們的勝利，他呼籲西方片面的民主應向真正完整的民主邁進。他描繪了他所需要的勝利：政治民主必須和經濟民主並舉，「必須把經濟制度改變，使人人都有經濟上的平等，政治的民主才有意義」。他認為這是二戰留下的一個最大的教訓和遺產，同時他強調這也是中國的未來。「我們必須根據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實現了政治和經濟的民主，我們才能被稱為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45]吳指斥了西方民主的虛偽，重提政治和經濟民主兼顧，而把民主的完善指向社會制度的變革，這種激進民主觀在當時基督徒中非常超前，而他從三民主義中找到了兩個民主的支撐，在戰前吳很少提三民主義，但戰時三民主義較頻繁地出現在他的話語中並視之為建國的最高方略，主要還是基於黨派團結的考慮。

國民黨在一黨專政下對憲政的一再拖延，似乎使人們忘記了三民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民主方案，重提三民主義無疑是催促國民黨落實憲政的尚方寶劍。美國傳教士畢范宇（F.W.Price）也肯定三民主義的意義，並認為中國將以此產生一個結合西方民主和中國背景的嶄新的民主政體。他談到：「中國將來必產生一種嶄新的民主政體，這個新民主政體，一方面有其自己的歷史背景，其民族的創造力，以及其特殊需要為背景，同時又與西方近代最優良的民主思想與經驗相交流。中國將來其本國內的民生主義及社會福利的實現——孫總理的第三個主義——並促進戰後國際間經濟的合作。中國在這種種方面，有待於國際上的協助的甚多，中國所要貢獻的也正多」。^[46]畢似乎也看到了三民主義在糾正西方片面民主上的價值，同時可作為化解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衝突的一個中間方案。

1943年下半年，美國基於對中國國內團結的憂慮，而督促國民政府從速實施憲政，以化解黨派矛盾，統一抗戰。促使國民黨9月召開的五屆十一



中全會重提憲政，打破了抗戰期間不提憲政的沉默，民主黨派人士順勢推導，而掀起第二波憲政浪潮。這些都觸動了基督徒的民主神經，而較廣泛地介入言說民主。

從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積極態度中可見一斑。1943年11月協進會機關刊物發文呼籲中國應學習美國這一先進民主國家的精神，自力更生，以三民主義建立大共和國，同時與國際合作建立一強有力的國際機構，使新民主的精神、新民主的制度普及於世界。^[47]以三民主義作為催迫國民黨走向民主也成為協進會的武器。爾後該刊又發表社論《我們所期望於憲政》，進一步希望以三民主義實現真正的民主。社論呼籲「我們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因為我們相信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是以完成民主，實施憲政為其終極的目的，若三民主義未曾實現，恐怕民主的基礎也不能確立」。現在的世界無疑是趨向民主的目標前進，我們應擁護政府頒布的憲法，但我們不只需要紙上的憲法，更需要憲法的實施。^[48]從三民主義通往真正的民主政治，這代表協進會的組織態度。

協進會更積極響應國防最高委員會研討憲法草案的號召，後者呼籲1944年5月5日前可以將任何對憲草的意見彙集呈送，作為將來國民大會的參考和準備。協進會發動全國基督徒研討五五憲草，供政府採擇。並特請立法委員羅運炎、中央宣傳部部長梁寒操、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盛振為、協進會協進月刊主編林永僕撰文為全國基督教人士提供參照。四人均為活躍的基督徒，後成書《怎樣研討「五五憲草」》出版，對五五憲草的內容、精神及其關涉基督教的要點與基督教參與憲政的方式等進行廣泛的討論。其中梁文著重強調了憲法必須以三民主義為根本，離開它不足以談憲法談中華民國。他強調「國父之三民主義是以科學思想作基礎，根據古今中外歷史的進化與社會的事實而發明，不僅適合中國國情，同時也是順乎世界潮流的，所以中國憲法的制定，自應以三民主義為依歸」。他總結道「中華民國是建立在三民主義之上的。民國是革命的產物，憲法又為保障革命基礎的工具，則中國的憲法，當然是三民主義的憲法，所以，離開三民主義，不能造成中華民國，沒有中華

民國，更無從談到憲法，這是五五憲草應以三民主義為基本精神的最大理由。」^[49]梁可能針對當時國內民主黨派中認為國家根本大法不能以某一主義為依歸而發，意欲規訓基督徒的憲法認知。

1944年畢范宇牽頭，中外基督徒共同努力曾出版小冊子《戰後的世界——戰後問題研究手冊》，明確將戰後的世界指向民主，且是新的民主。在國際上「每個國家不但須實行國內的民主，且須為實現國際間的民主而努力。這個國際間的民主，必須是政治的、種族的、經濟的，以及文化的民主。世界上今後再不得有『優秀民族』，種族的凌越，或殖民地的剝削等荒誕的思想或現象存在。三民主義必須普遍地應用於全世界上」。而在中國「她不但要完成在國際上的自由，而且要完成國內的自由，她必須向民主主義的實現，和三民主義及四項自由的大道上奮勇邁進」。^[50]民主是中國的出路，也是世界的未來，民主必須由國內走向國際，由政治擴展到經濟等其他諸多方面。

而隨後豫湘桂戰役帶來的國土淪喪，給基督徒上了最深刻的一課。在怎麼辦的追問中，《天風》社論找到了民主，不民主是戰爭失敗的原因，而唯有民主才能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社論介紹各種救時主張「一個共同的趨勢，就是一致要求當局能立即改弦易轍，放棄如孫科氏所謂由一黨一派一人包辦的政治作風，澈底地迅速地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呼聲一度高漲，迫使國民政府承諾民主，蔣的戰後允諾成為基督徒的希望。「蔣主席於元旦廣播詞中，說不待戰後即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還政於民。這一開明的昭示，已經博得全國乃至全世界愛好民主的人們讚頌，我們殷切地希望這個諾言能在最近期內有具體完善的事實表現！」^[51]國民黨的憲政允諾可能有被迫之意，但卻給基督徒帶來巨大的希望。

戰爭將近結束，戰時黨派合作的基礎失落，而面臨分裂的危險。民主被基督徒詮釋成維護和挽救團結的門徑。第二次憲政運動的餘波，1944年9月中共民主聯合政府論的出台，特別是對戰後黨派分裂的憂慮，使基督徒對民主的呼求走向迫切。戰後是中國民主成為可能的最好時機，但同時埋伏著巨大危險。基督徒希望完成一次民主的突圍，

因抗戰凝聚起來的團結，如果沒有民主，在抗日完結時後果不堪設想。民主成為一根救國防止分裂的稻草。正如辛斤所言「中國的勝利，始於國土的恢復，終於現代民主政治的建設。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便絕對談不上勝利」^[52]。中國必須走向民主，它同樣是中國的未來，中國民主匱乏的現實在召喚民主，也增添了它在中國的份量，只有它能夠避免戰後的黨派分裂。

1945年5月《天風》社論強調，團結是一個政治問題，團結並不在各政黨去除隔閡，彼此合作就能達到。「政黨的不能團結，不是由於政黨本身的不能互相合作，而是由於團結的基本條件——民主政治——沒有澈底實現的緣故。在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政黨的合法地位還沒有澈底被承認，被尊重以前，真正的團結當然談不到。況且在這全世界民主浪潮中間，中國的人民，已經自覺起來，要求全國的大團結。為了消滅世界法西斯，建立新民主而奮鬥。這種要求，已經超過黨派團結的要求，惟有實現民主，才能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也就包含了各黨派的團結。所以我們認為民主是團結的前提。」^[53]分裂正是不民主的結果，唯有民主才能成就真正的團結，在對分裂的憂慮中，基督徒以民主求團結，其對民主的追索也進入一個新階段。

結語

抗日戰爭是中國民主追求中的一個火的試煉，中國基督徒也不例外。「九一八」後的抗日民族危機的高漲，為集權提供現實土壤，促使少數基督徒暫時疏離五四以來一直堅守的民主，而實用主義的擁抱新式獨裁。但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為了實現黨派的團結和全民的抗戰動員，基督教內完成較為統一的民主站隊。他們將民主視為獲取抗戰勝利的最後保障，也代表他們抗戰建國的終極願景，是他們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的一種表示。所以他們積極投入抗戰時期的兩次憲政運動，承擔起作為一個國民的時代義務。但在政治目的之外，其對民主的訴求也帶有強烈的宗教關懷，他們通過對民主和基督教關係的再詮釋，將基督教視為民主的來源和中保，是一種向中國展示基督教價值的話語努力。同時也是想借此將基督教內部停

留在純宗教範圍、疏離現實救國的廣大基督徒納入抗戰建國的時代進程，為他們以民主為階梯投入新的歷程提供鋪墊，以進一步凝聚基督教內部的共識、團結和統一。所以，民主既是中國基督徒宗教認同的一種表達，也是其藉以重塑宗教認同的外在資源。總之，中國基督徒對民主的想像，處在主觀和客觀之間，既是對客觀現實的一種映射，也是一種想像性的建構和目的性書寫，是他們自我欲望的投射和自我認同的表達，是其重建政治認同、國家認同和宗教認同的一種方式。

[1] 詹文滂：〈近世民主主義的面面觀〉，載《青年進步》第114期，1928年6月，第15頁，第2頁。

[2] S.C. Easton, *The Western Heritage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6, p.419.

[3] Hans Kohn, *The Survival of Democracy, The Christian Century*, V.54, No.30. Jul 28, 1937, p.945.

[4] 〈歐美社會貧富階級現狀〉，載《興華報》第28卷第11冊，1931年4月1日，第8頁。

[5] 培玉：〈一年來的世界政治危機〉，載《上海青年》第32卷第8號，1932年3月31日，第2頁。

[6] 〈在創造新社會制度中上帝的意旨對於青年之挑戰〉，載《消息》第10卷第1期，1937年1月，第21頁。

[7] 陳文淵：〈時代轉變與基督教運動〉，載《中華歸主》第177期，1937年6月1日，第7頁。

[8] 從之：〈中國國民黨有沒有麥克唐納爾？墨索里尼？〉，載《上海青年》第31卷第48號，1931年12月3日，第5頁。

[9] 趙鴻祥：〈權威，卑屈，與人子〉，載《真理與生命》第7卷第4期，1933年1月，第5頁。

[10]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頁。1936年初版。

[11] 蔡重光：〈新國家實現步驟問題的檢討——與閩南基督徒學生作一個商榷〉，載《救國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第14-15頁。

[12] 蕭文若：〈我對於大會的感想〉，載《中華歸主》第158期，1935年9月1日，第11-13頁。

[13] T.L. Shen, *The People's Movement, 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1937, p.82.

[14] 李聖華：〈抗戰之獲得〉，載《廣州青年》第25卷第3號，1938年2月7日，第9頁。

[15] 吳耀宗：《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上海青年協會



- 書局，1938年版），第32-33頁。
- [16] 吳耀宗：《烈火洗禮中之基督徒》，《光明與黑暗》（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9年版），第308頁。
- [17] 〈全國基督教學生代表會議宣言〉，載《消息》第12卷第3期，1939年10月，第2頁。
- [18] 羅茜：〈基督徒學生與民主政治〉，載《消息》第12卷第4期，1939年12月，第9-12頁。
- [19] 哥林：〈為什麼要實行民主政治〉，載《消息》第13卷第1期，1940年2月，第29-30頁。
- [20] 歌林：〈基督教學運和青年節〉，載《消息》第13卷第2期，1940年4月，第22頁。
- [21] 沛文編：〈學生生活與民主〉，載《消息》第13卷第3期，1940年6月，第88頁。
- [22] 常青：〈為什麼基督徒也要求民主〉，載《同工》第189期，1940年4月，第25頁。
- [23] 張仕章：〈青年的信仰問題〉，載《同工》第190期，1940年5月，第24頁。
- [24] 張仕章：〈耶穌聖誕與天國福音〉，載《上海青年》第38卷第23-24號，1938年12月25日，第14頁。
- [25] 同注[15]，第32頁。
- [26] 吳耀宗編：〈基督教與民主七課〉，載《同工》第191-192期，1940年7月，第74頁。
- [27] *The Church 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in a Period of National Transition*, Mysore City: The Wesley Press and Publishing House, 1938, p.93.
- [28] 錢國寶：〈基督教與精神總動員〉，載《同工》第189期，1940年4月，第15頁。
- [29] 白石：〈為什麼基督徒也要求民主〉，載《同工》第189期，1940年4月，第30頁。
- [30] 謝扶雅：〈基督教與憲政〉，載《消息》第13卷第2期，1940年4月，第9-10頁。
- [31] 路西：〈基督徒對實施憲政的認識〉，載《消息》第13卷第2期，1940年4月，第12-14頁。
- [32] 〈全國基督教學聯協會推進民主憲政運動〉，載《消息》第13卷第2期，1940年4月，第61-63頁。
- [33] 〈基督徒和實施憲政討論大綱〉，載《同工》第189期，1940年4月，扉頁。
- [34] 以佶：《什麼是我們行動的方向》，載《消息》第13卷第1期，1940年2月，第14-15頁。作者即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女公使，著名外交家俞沛文夫人，兩人於1930年代末畢業於滬江大學。1938年雙雙加入中共，以基督徒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活動。俞在青年會全國協會任幹事，1946年兩人赴美留學，1948年歸國，俞仍入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解放後進入政府服務外事。
- [35] 吳耀宗：《編者的意見》，吳耀宗編：《基督教與新中國》（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年版），第277-278頁。
- [36] 斐明：《青年會與民主運動》，載《同工》第186期，1940年1月，第16-17頁。
- [37] 同注[26]，第78頁。
- [38] 劉廷芳：〈制度與人格——教師識路——民治的實現〉，載《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6卷第3期，1940年9月，第4頁。
- [39] 劉廷芳：〈宗教——教育——與民治主義〉，載《宗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1期，1941年3月，第2-3頁。
- [40] 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此次世界大戰研究大綱》（成都女青年會全國協會，1942年版），第46頁。
- [41] 吳耀宗：《基督教與新中國》，《光明與黑暗》（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9年版），第332-335頁。1942年4月發表於《公報》。
- [42] 沈子高，沈佩蘭記：〈基督教與政治〉，載《基督教叢刊》第3期，1943年8月1日，第7-8頁。
- [43] [加]Gregory Vlastos，張雪岩節錄：《基督教信仰和民主主義》，載《基督教叢刊》第2期，1943年7月1日，第34、40頁。
- [44] 同上，第47-48頁。
- [45] 吳耀宗：〈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勝利〉，載《基督教叢刊》第2期，1943年7月1日，第8-9頁。
- [46] 畢范宇：〈中國的抗戰與中國的和平〉，載《基督教叢刊》第3期，1943年8月1日，第11頁。
- [47] 〈從美國對於戰後世界建設的研究說到我國〉，載《協進》第2卷第3期，1943年11月，第6頁。
- [48] 〈我們所期望於憲政〉，載《協進》第3卷第3期，1944年5月1日，第1頁。
- [49]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事工報導〉，《協進》第3卷第2期，1944年4月16日，第15頁；梁寒操：《「五五憲草」的基本精神與要點》，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編：《怎樣研討「五五憲草」？》，重慶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44

年版，第4-6頁。

[50] 畢范宇：〈戰後的世界——戰後問題研究手冊〉，《基督教叢刊》第6期，1944年5月1日，第18頁。

[51] 〈我們應該怎麼辦？〉，載《天風》第2期，1945年2月25日，第3頁。

[52] 辛斤：〈上帝的呼聲〉，載《天風》第11期，1945年6月18日，第16頁。

[53] 〈團結〉，載《天風》第9期，1945年5月23日，第1頁。

Democratic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Politics of Chinese Christian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Xu Junlin (Shanghai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Abstract: Christians had been active participants in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but stimulated b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tragedy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of democracy, a few Christians temporarily and pragmatically opted for a new form of dictatorship.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achieve maximum mass mobilization and intra-party unity, especially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completed a relatively unified democratic stand, seeing democracy as a guarantee of victory in the war.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of 1939-1940, which was set off by a series of democratic expressions by the Kuomintang, Christians were widely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s of this movement and were inspired to join the ranks of those promoting democratic politics. But after the first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was aborted in September 1940 due to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delays, the Christian rhetoric of democracy fell into relative silence due to the Kuomintang's wartime refusal to menti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League in January 1942,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became a slogan that strengthened Christians' confidence in and desire for democracy, and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second wave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reflecting on the one-sidedness of Wester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launching new thinking about a new Chinese-style democracy to accomplish the goal of democratic nation-build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Christianity, Democracy, Democracy Movement